

郭冠忠 著

西藏社会发展述略

——郭冠忠藏学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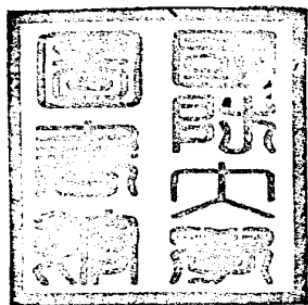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0 7561 7

西藏社会发展述略

——郭冠忠藏学文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学知识
PDG

责任编辑:杨芳萍

封面设计:丹 朗

西藏社会发展述略

——郭冠忠藏学文集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微机室排版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47千

1999年3月 第一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1—1,000

ISBN7-223-01136-X

B·34 定价:10.50元

序 言

在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到来之际,西藏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西藏社会发展述略——郭冠忠藏学文集》。本书共收集了作者有关西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12 篇。

作者郭冠忠同志从 1949 年 3 月起,在 18 军随营学校 8 中队政治系学习,同年 12 月毕业,1951 年 6 月随 18 军进藏部队先遣支队政治部到达拉萨,先后在拉萨市、彭波农场和自治区农牧政治部工作,多次随工作组在乡村、寺庙工作,了解掌握西藏经济、社会、政治情况,为研究藏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66 年以后的十年动乱期间,西藏也和全国一样,经受了一场浩劫,郭冠忠同志也受到迫害。1971 年 10 月起,先后在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自治区革委会农牧局农业组工作,1977 年 10 月内调,在西藏工作近 27 年。

郭冠忠同志在西藏工作期间,无数次的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民情,体验生活,积累素材,记写了江孜、白朗、拉加里等地区的调查材料,也参与起草过许多农牧区政策性文件、自治区领导讲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写过青海循化、民和、互助三县,宁夏海源县,广西龙胜县、临桂县的经济教育调查报告,西藏 1983 年灾情情况内部调查报告,供中央有关部门参考。还参与编写了《西藏地震史料汇编》、《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的民主改革》、《民族辞典》、《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与王玉平合作翻译了东嘎·洛桑赤列所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单独翻译了《十三世达赖土狗年(1899 年)布告》等多篇藏文历史档案,其中《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1991 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与此同时,郭

倒

冠忠同志还在《民族研究》、《西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多篇,其中《略谈西藏社会的巨变》一文,倍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重视,有的论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

《西藏社会发展述略》主要是从西藏和平解放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藏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来论述的。通过新旧西藏在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对比,充分展现出新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了主人,过上了自由幸福生活的风貌。本书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西藏社会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论述:

一、“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把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法律地位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对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行使主权,维护和改革当时现行的社会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发展西藏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的生活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便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证。

二、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西藏实行改革而不像内地一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为什么在进行民主改革时不能生搬硬套内地的改革经验而要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采用特殊的“慎重稳进”的方针进行改革?

三、为了加深对西藏的再认识,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实,揭露了西藏封建庄园内、外“差”剥削及经营管理制度、三大领主对农奴、奴隶的残酷剥削等。

四、作者在书中还回顾了当年 18 军等部队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后,遵照上级指示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心当地人民的疾苦,并积极地帮助解决疾苦和困难。从此,18 军等部队的指战员的命运便同西藏人民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他们为了西藏的解放以及西藏的改革和建

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开始对西藏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地理等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五、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后,西藏无论社会制度、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藏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坚决执行中央在西藏实行的“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同时,开展了帮助各地修公路,办小学,免费为藏胞治病,发放无息农牧业贷款,救济遭灾的农牧奴,扶助当地发展经济等,做影响和团结群众的工作。青藏川藏公路的开通,一批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商业、银行等经济实体的建立,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成果,开始在西藏扎根。随着平叛的胜利,一场全面深入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农村、牧区、城镇、寺庙逐步开展起来,并在全区普遍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百万翻身农奴做了社会的主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4月中央召开了西藏第一次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在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和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由于改革开放,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藏在国家和各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援下,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多条公路的开通,空中航线的连通,已根本改变了西藏原来交通闭塞、运输全靠人背畜驮的状况。总之,经过四十年的努力,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已初步成为现实。

六、作者还用较大的篇幅回顾了当时西藏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前后的情况。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机关,是伴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的任务完成,用了15年时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

毛主席为推动西藏工作朝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方向稳步前进,在1954年10月9日、10日分别会晤达赖、班禅时提出:西藏不可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先成立自治区筹委会,以便为正式成立

统一的西藏自治区开展筹备工作。在此期间，西藏虽然没有按照“十七条协议”的规定统一成立军政委员会，改编藏军，也没有像内地新解放区那样，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搞土改，但由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西藏的特殊情况出发，正确地 为西藏制定了一整套特殊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加上进藏解放军、干部和西藏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西藏还是遵循“十七条协议”大多数条文的规定把改革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西藏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为成立自治区筹委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随后，相继成立了相应的机构。1959年，西藏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叛乱平息后，自治区筹委会根据人民的愿望和社会经济特点，认为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已成熟。

由于条件已逐步具备，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它标志着西藏的民主改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也为西藏继续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七、作者还对50年代中期以后，西藏工作出现过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

读了这部文集，好似作者带着我们一起浏览了一遍西藏改革、建设的征途，亲身体会到了西藏革命事业取得了今天这样辉煌成果来之不易，使我们更加自觉地珍惜西藏四十年取得的革命成果，为西藏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力量。读起这部文集，文字流畅，叙述真切，给人以新颖、全面、更加切合西藏实际的感受。谁要想了解西藏改革、建设走过的历程，都有必要读一下这部文集，而且，一定会有一种新的收获，将会产生一种更加热爱西藏的建设事业的信心和力量，投身到建设西藏的事业中去。

白 涛

1999年2月10日

目 录

序言

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应发扬光大

——回忆在 50 年代参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的体会 (1)

西藏社会巨变述略 (16)

藏文《水牛年文书》和《新订章程二十九条》探析 (24)

论西藏封建庄园的内、外“差”剥削 (40)

论西藏封建庄园的经营管理 (52)

1949 年 7 月 8 日西藏“驱汉事件”原委 (63)

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研究 (79)

西藏民主改革的回顾与研究 (120)

西藏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机关的回眸 (158)

1959 年 3 月 10 日“西藏独立运动”的真相 (194)

论西藏的人权和主权 (199)

1962 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历史追述 (204)

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应发扬光大

——回忆在 50 年代参加西藏社会 历史调查的体会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 1930 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50 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二野司令部联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 军等已经领受进军西藏任务的部队发布政治动员令时,即命令这些部队“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关心当地人民的疾苦,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在当月 6 日和 19 日,由邓小平和刘伯承分别给这些部队的题词中还写道:“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要“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领和民族政策。”从此,18 军等部队的指战员的命运,便同西藏人民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为了西藏的解放以及西藏的改革和建设,我们从那时起,就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开始对西藏的社会历史和自然地理等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作为原 18 军的一名战士,我参加了进军和解放西藏的历史进程,进藏及转业到中共拉萨市委秘书科、中共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工作了近 27 年,曾在 50 年代参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时光飞逝,转眼至今已是 90 年代末了。回首当年参加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情景,至今仍然感到很荣幸,很受教益。

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95年7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载,邓小平、刘伯承等同志是在1950年1月7日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18军等部队担负进藏任务,并于当月10日和15日将18军军、师级主要领导召至重庆给他们下达和部署进藏任务的。我当时刚从贵州行军至四川泸州市的兰田坝,就被调到18军随营学校给该校政委林亮(已故)当警卫员。他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北京清华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一二·九”运动时的该校《觉报》的负责人之一,是一位颇有学者风度的革命领导干部。当时,他叫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随他到泸州市的大街小巷逛旧书摊,寻觅和购买有关西藏的旧书,让我抱回宿营地。其中有清代的线装书《卫藏通志》、日本人山县初男编的《西藏通览》、民国时期刘曼卿写的《康藏远征》、洪涤尘写的《西藏史地大纲》等等。当时,进藏的命令还未传达到我们这些普通战士,我的心里很纳闷,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买这些旧书。现在看来,自然是因为他已得到了18军将要进藏的信息,为了研究西藏的情况,他才这么做的。

当年2月,18军随营学校移师四川乐山,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因在川南、川西又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入学,全校人数已增至约5000人,仍归18军党委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和二野司令部联合向18军等部队发布的政治动员令和邓小平、刘伯承的上述题词,已逐步传达到八分校的全体人员。从校长、政委直至每一个学员、战士都踊跃地向党组织表示了进藏的决心,递交了决心书。当时,按照18军党委的要求,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的任务,是为解放和管理西藏培养、输送军政干部。为此,在教学内容上,已经增设了关于共同纲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介绍康藏自然社会情况的课程,还聘请曾在西藏当过喇嘛的一位汉族高僧,在乐山开办了藏语文班,请52师师长吴忠(已故)同志给全校

师生作关于党的和平解放西藏方针以及西藏昌都地区自然、社会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八分校校部的林亮等同志收购到的有关康藏的旧书，比以前更多了，并在校部办公室的一角陈列起来，供大家阅览。林亮对警卫员的学习一向十分关心。在当时实行供给制的条件下，他不仅给我提供纸、墨、笔，规定我每天写毛笔字、写读书心得的任务，还鼓励和支持我抽空去八分校藏语文班旁听，去校部办公室阅读关于康藏的旧书。我的一些有关康藏的知识，起初多半是从这些旧书中获得的。

不过，这些旧书大都是关于康藏的自然地理、风土环境、语言文字、宗教习俗、官制品职等方面的记述，关于该地方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经济政治结构、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内容则很少。所以，虽然我们18军随营学校在河南、安徽和南京，在解放中南、横渡长江、接管伪总统府和解放大西南的征途中，学习过解放社出版的由艾思奇等同志编著的《社会发展简史》，接受了关于人类社会经历过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的教育，并通过学习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知道了我国解放前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仅通过阅读关于西藏的那些旧书，却无法把已学到的上述理论知识与之对上号或挂起钩来，即对西藏解放前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我们那时还不甚了解。加上当时我们还未到达西藏，与当地社会无任何直接接触，不可能有什么感性认识，那些旧书上关于西藏的记述，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比较浮浅，只给我们对西藏的深入调查提供了一些线索，起了一些引导作用。

二

1950年9月，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骑兵师先遣连和平进驻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改则宗(县)；10月，18军的5个团和14军的

126 团等，解放了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的 10 多个宗(县)。次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当月 25 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向各路进藏部队发布了进军前后藏的训令。根据毛主席的训令，18 军决定在昌都组建先遣支队赴拉萨。林亮被调到先遣支队任政治部主任，我未继续给他当警卫员，而是被分配到政治部秘书科做工作员。在秘书科，有一位邓明渊同志(已故)，是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藏汉文翻译，藏语文水平比较高。其他科还有列协、居勉等好几位在 18 军途经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时参军的四川巴塘藏族。当时，从甘孜至拉萨不通公路，道路崎岖险峻，空气稀薄，加之共和国初建，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又加抗美援朝战争等原因，进藏部队的物资供给受到限制，我们在进军拉萨的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是如今所难以想象的。但那时部队官兵的情绪高昂，团结得犹如一个人一样，没有叫苦叫累或怕死当逃兵的。邓明渊、列协同志不仅像我们一样，徒步负重 冰河，爬雪山，日行军四五十公里，还坚持一边行军，一边教我们这些没有在康藏高原生活过的同志学习藏语文，学习其他适应高原生存环境的知识。这对我们此后开展西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1951 年 9 月 9 日，先遣支队和平进抵拉萨，当天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先遣支队政治部遂遵照中共西藏工委的决定，整建制地转到地方，对内宣布组建为中共拉萨市委，由林亮任首任市委书记。不过，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外仍然沿用先遣支队政治部的名义，故而大家都未脱掉军装。怎样开展工作呢？按照党中央于 1952 年 4 月初给中共西藏工委的指示，就是要了解各种情况，从具体情况出发，稳步执行“十七条协议”，就是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3 页)这种“和平改革”的工作方针是同毛主席

在“十七条协议”签订那天傍晚提出的“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论点一脉相承、相互一致的。

根据中央的上述方针和中共西藏工委的指示，林亮等同志首先带领我们通过登门拜访、举行各种节日庆祝活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开展了争取团结原西藏地方政府朗子辖（市政府）、雪列空（相当于拉萨专署）官员和各大贵族家属子女的上层统战工作。同他们协商成立了拉萨市爱国青年、妇女文化联谊会、爱国卫生委员会、联合治安办公室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还组织一些贵族青年成立了足球队和男女篮球队、文艺演出队等。我们当时就是以这些方式同西藏上层人士建立联系的。在与他们有了联系的基础上，即一方面向他们宣传“十七条协议”、共同纲领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另一方面结合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当地各种情况。正是通过这样的联系和调查，我们了解到原西藏地方政府是封建贵族和上层僧侣共同组成的，其法律制度都是百年、数百年前制定的，对人民的统治十分残暴，人被分成三等九级，封建的等级制度森严，包括其官制品职、顶戴级别和许多服饰礼仪的样式和名称，都还在沿用清代实行的那一套。藏军是清朝乾隆皇帝批准，采用向人民派兵“差”的办法征集和建立起来的，至我们进藏后，其编制、体制和征集办法仍沿袭旧例，但其一些军官则在 1888 和 1904 年英国武装侵略西藏，强迫清朝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逐渐接受了英国人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穿上了英式制服。藏军的乐队还常用西洋乐器，演奏民国时期内地少数城市中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多》曲调，以它作为军乐在拉萨招摇过市。城区附近的甘丹、色拉和哲蚌三大寺各有数千名喇嘛（分别额定为 3300 名、5500 名、7700 名，实际已突破），不仅占有着中央皇帝和西藏地方首领封赐的大量耕地、牧场、牲畜、房屋以及属民等庙产，还是西藏最大的高利贷者，而且在西藏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拉萨每年举

行传召法会时，拉萨市的行政、司法权，即被三大寺接管。十几家大贵族和几个大活佛的官邸、住宅和别墅，是当时拉萨最豪华的建筑，都有几十、上百名奴仆侍奉。有的大贵族沉湎于吃喝嫖赌、声色犬马、吸食鸦片、海洛因的腐朽、糜烂的生活之中。而在拉萨市今沿河路一带，则常有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和衣衫褴褛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从破烂不堪的帐篷里挣扎出来，到八廓街、琉璃桥等处向过往行人叩头乞讨，甚至同窜来的野狗争抢富人施舍的残羹剩饭。原西藏地方政府的警察、“郭央娃”（巡街者）、铁棒喇嘛和藏军常在大街上毒打老百姓，并且能看到戴着木枷、脚镣的“罪犯”沿街讨饭。市场出售的商品，一部分是当地出产的农牧土特产品，其他如毛料布匹、蜡烛火柴、食糖香烟、食用椰子油、手表、收音机、化妆品、文具等日用百货都是进口的，并且有进口的手枪和子弹公开在市场上销售。以上许多现象，都是我们在已搞了多年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内地家乡所不曾看见的。所以，我们随时把所了解到的这些情况都向领导上做了口头或书面汇报。

与此同时，我们还结合农贷工作，到雪列空管辖下的一些农村开展社会调查。因为我们将给群众发放的农业贷款是无息的，同西藏贵族、寺庙以及官府向群众进行高利贷盘剥的制度迥然不同，所以，当地的个别当权者，便暗中进行破坏和阻挠。在1952年夏，我随同多杰才旦、谭俊起、周祖耀同志去拉萨河南岸的柳吾宗搞农贷和社会调查时，被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重要官员知道了，他就匆忙从拉萨赶赴柳吾宗，向群众造谣说：“接受共产党的无息农贷后患无穷，他们会‘先甜后苦’，抢走藏人的子女和财产，”并指使小头人带领二三十名该官员的属民到我们住地“请愿”，声言其主人待他们“极仁慈”，“根本不需要‘佳共产’（汉人共产党）的贷款。”迫使我们只得觅雇毛驴驮上从拉萨运来的约4000块银元，离开此地步行去南木甲岗。到南木甲岗也是同样遭遇。到协绒时，我们还因为未找到住房投宿，而在荒野挖沙坑，借助于沙子已被白天的太阳晒

热的余温，睡在沙坑里度过了一夜。1953年夏，我同另几位同志到拉萨东北约50公里处的原蔡德庆宗，发放无息农贷和搞社会调查时，由于当地个别头人造谣破坏，使有的村民害怕同我们见面，未等我们进村，他们就逃往山上躲起来了，有的则放纵拴在家里的獒犬扑向我们。我就因为在曲桑村被一獒犬咬伤，有半个月时间行走很困难。

不过，共产党、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好心终归有好报。所以，我们在上述地方，也遇到了不少敢于冲破当地反动头人的阻挠，向我们反映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要求给予贷款的。有的还悄悄向我们控诉其主人残酷奴役和剥削他们的恶行，请求共产党、解放军帮助改革旧制度。有的则带领我们去查看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住房无法遮挡风雪的悲惨生活。在上层当权者中，也有不少开明进步的人士，对我们发放无息农贷和搞社会调查表示热烈欢迎，并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帮助我们解决食宿和运输问题。前述蔡德庆宗的宗本（县官），还曾主动向我们介绍当地的社会情况，将保存在宗政府的藏文档案借给我们查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引起不必要的疑虑和麻烦，我们借到藏文档案后，便连夜借手电筒的光线在被窝里把它们抄录下来。在调查访问时，我们都不当着对方的面作记录，而是回住地后追记。许多数字不易追记，就在同调查访问对象谈话前，将硬纸片装在衣兜里，一边与他们谈话，一边执铅笔在衣兜里将数目字写在硬纸片上，回住地追记时将必要的数目字补充上去。正是依靠他们的支持和采用这样的调查方法，我们每一次完成农贷任务时都能遵照上级的要求，整理编写出一份社会调查材料报送领导同志参考。1953年底，我被调到西藏工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政研室主任是工委秘书长牙含章同志（已故）兼任的。由他主持我们同工委统战部、财委的同志编写《西藏宗谿名称和人口》、《西藏地方政府的财政概况》、《西藏商业情况》三本调查材料，也是由于承蒙西藏爱国进步的上

层人士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才得以完成的。

总之，经过以上的实地调查，我们已了解到不少我们进藏前在汉文旧书中所未曾看到的实际情况，使我们对西藏社会有了初步认识。

三

1954年7月17日凌晨，位于西藏江孜东南涅如山顶的色旺湖堤崩溃，溢出的湖水顺年楚河而下，江孜、白朗、日喀则沿河两岸遭受严重洪灾。中共江孜分工委立即将灾情电告中共西藏工委，西藏工委又及时报告党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当即拨给80亿元（旧币）救灾款，币制改革后又续拨240万元赈济款。西藏工委经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协商，让他们派出仲译钦波拉乌达热·土旦丹达与江孜分工委书记阴法唐等同志联合组成了救灾委员会。并决定从工委机关动员20几名干部前去支援救灾，结合救灾进一步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我是报名参加此次救灾和社会调查工作的一员。我们一行在工委财委的李达（已故）、吴贵东同志率领下徒步奔至江孜，被分工委和救灾委员会分配到各个救灾小组工作。起初，我被分到年楚河西岸上起帕拉庄园，下至与白朗宗交界的格西小组，组长是大贵族格西（即多仁公班第达）的大管家，副组长是李达同志和小贵族哲迪（也是大贵族格西的“孝折”——扈从）。后又调到年楚河东岸上起江孜城郊，下至与白朗交界的藏改小组，由贵族汤麦的大管家任组长，我和小贵族达惹任副组长。从1954年8月至1955年5月，在这些地方搞了9个月的救灾和社会调查工作。

遵照工委、分工委指示，我们在救灾工作中，不仅尽力做好上层统战工作，遇事先同他们协商，充分尊重上层人士的意见，而且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深入群众之中，了解每一户藏胞

受灾的详细情况，然后对受灾户分别其轻重程度逐一造册登记。在与救灾小组内上层人士的正副组长协商，并征得当地头人和群众代表同意后，将国务院拨给的救灾款以及驻藏解放军等单位捐赠的大米、衣物，还有原西藏地方政府拨给的 15 万斤青稞分送到每一个灾民手中。并组织他们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参加日（喀则）——江（孜）公路以工代赈的筑路工程。通过救灾，不仅帮助群众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部分困难，使他们渡过难关，而且使广大灾民切实感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和爱护，扩大了共产党、解放军在藏族群众中的良好影响，使藏族群众爱戴共产党、解放军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

与此同时，我们遵照工委、分工委的要求，结合救灾工作，按照预先拟定的调查提纲，把对江孜、白朗地区的社会调查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因为了解灾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调查，同对当地政治、经济等情况的社会调查并无矛盾，又加上此次调查是通过上层统一战线性质的救灾机构进行的，可以按照了解灾情的需要召开调查会、座谈会，进行比较广泛的家庭访谈或个案登记，这次调查所获得的事实材料，就比以往通过农贷等形式进行调查所获得的事实材料要广泛、具体、深刻得多。

救灾工作结束时，我们每个救灾工作小组，都向上级报送了本小组辖区内社会情况的调查材料。在阴法唐同志主持下，我和安钊、谢广亨、孙兴国等同志，一方面将各救灾小组报送来的调查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一方面加强了对关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理论知识的学习，并将列宁所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关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的论述，同西藏的实际情况相对照、相联系，反复切磋、讨论，既分工又合作，共同整理撰写出了题为《江孜、白朗地区土地关系、差役制度和高利贷情况的调查材料》，共 8 万字。最后由阴法唐同志亲自动手逐段逐句修改定稿后上报西藏工委。在该《调查材料》中，我们将西藏官府、贵族和寺庙三大类封建领主占有土地等